

doi:10.19920/j.cnki.jmsc.2025.12.004

得偿所愿还是南辕北辙：贸易参与、 市场拥挤与就业质量提升^①

陈 昊¹, 赵子薇¹, 孟怡珺^{2*}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9; 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能否提升城市的就业质量?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引入市场拥挤概念和系统阐释参与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以中国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 更多企业从事国际贸易虽然扩大了城市就业规模, 但是由于市场拥挤效应存在, 无法提高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且无法实现就业产业结构优化。这一结论表明长期来看, 贸易参与主体规模扩大无法有效提升就业质量, 不应把提升就业质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业从事国际贸易上。为了保障企业维持稳定的创造就业和提供岗位待遇的能力, 不仅应该有鼓励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政策, 还应该建立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 国际贸易参与; 市场拥挤; 就业质量提升; 交错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5)12-0046-14

0 引言

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国际贸易水平能有效促进就业增长, 这不仅在理论和实证上得到学界的充分证明^[1-6], 而且已经转化为各种被政府广泛施行的政策。2019年12月1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稳定外贸来扩大就业。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 在国内劳动力供需两端都受到疫情强烈冲击的背景下, 政府又提出要“通过稳外贸来稳就业”, 足见国家对发挥国际贸易促进就业增长的效果高度重视。

但是就业增长并不等同于就业质量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证明党

和国家不仅关注就业增长, 更重视就业质量提升。从理论上说, 虽然贸易规模增长会提高就业水平, 但贸易参与主体规模扩大, 即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却未必能提升就业质量。产品需求存在上限, 尤其是近年来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大量企业涌向国际市场可能产生“市场拥挤”(market crowding)。“市场拥挤”一方面压缩所有企业的利润空间, 从而削弱贸易创造就业岗位或提高工作收入的能力, 另一方面根据 Pissarides^[7], 大量招聘和应聘出现在劳动力市场, 将显著提高空位和失业间匹配成本。这些都可能对就业质量产生消极影响。从现实来看, 政府要求实现的“高质量就业”不仅是一次性的就业恢复与增长, 更是企业“持续稳定”提供岗位, 工人“持续稳定”从事工

① 收稿日期: 2023-01-09; 修订日期: 2023-08-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7210303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项目(21JQ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21CGL03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2409).

通讯作者: 孟怡珺(1988—), 女, 浙江湖州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Email: ymeng@suibe.edu.cn

作,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就业产业结构“持续稳定”优化。因此,一个重要问题亟待回答: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究竟如何影响就业?在对外贸易的就业促进效应上,贸易参与主体规模扩大,对实现提升就业质量的目标而言,究竟是“得偿所愿”,还是“南辕北辙”?

相比于研究贸易规模对就业的影响,几乎很少有文献专门探讨贸易参与主体规模与就业质量的关系,因为是否参与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企业的自选择行为,而评估这种自选择行为往往存在很强的内生性风险。对企业来说,是否开展和以何种形式开展对外贸易、开展多久的对外贸易,以及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都是基于个体最优化做出的选择。国际市场的进入和竞争门槛,决定了不是所有想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都能进入国际市场。大量研究表明,往往是生产率高的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8-13],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是高生产率企业主动选择参与国际贸易,而非国际贸易提高了参与者生产率,即国际贸易存在的“自选择效应”大于“学习效应”^[14-16]。也即,在不施加外部政策干预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会自动选择高生产率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由于自选择行为存在,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是内生的,直接进行回归分析难以得出准确结论。何况国际秩序的变化也带来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特征改变^[17],评估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困难越来越大。

2015年国家开始设立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简称“综试区”),为本文提供了一个研究上述问题和克服内生性的绝佳的“准自然实验”。首先,设立综试区是一个渐进过程。这种渐进政策的设计客观上为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跨度。其次,设立综试区可以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研究显示,跨境电商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搜寻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18],从而帮助企业突破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提高国际贸易参与度,这将很好地降低自选择效应带来的内生性风险。再次,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企业贸易发展特征不同,周沂等^[19]指出一个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会显著影响该地区出口规模扩张与产品质量提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综试区的本意与促进就业的政策目标毫不相干,因此只要选取恰当的控制变量以保证条件独立性满足,它就可以作为足

够外生的冲击来有助于准确评估贸易参与主体规模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综试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为类似主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此外,本文还具有如下贡献:首先,该研究结论提示,有必要从理论层面重新审视贸易参与的微观主体结构与就业的关系。近年来对贸易和就业关系的机制研究,主要依赖 Melitz^[20]提出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围绕外贸企业存在“高筛选门槛”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进行搜寻—匹配的基本事实展开^[21]。在该理论框架下,由于缺乏对需求方的讨论,实际上默认市场容量无限,这自然会得出贸易提高就业和工资水平的结论。但在现实中,需求有限,随着国际市场上企业数量增加,“市场拥挤”可能终将显现,从而影响所有贸易参与主体的利益,产生一系列消极作用。其次,本文实证研究论证了贸易参与主体规模扩大无法有效提升就业质量的事实。利用2012年—2021年271个地级市数据进行的交错双重差分(staggere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简称“Staggered DID”)估计发现,设立综试区虽然扩大了城市整体和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就业规模,但是对人均工资增长没有好处,也未能优化就业产业结构和提升就业增长率。最后,本文研究结论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味鼓励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可能非常有限,因为国际市场拥挤问题不容忽视。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1 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1.1 政策背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以国际贸易为主要表现的商务交易行为开始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借助电子商务模式的优势全面发展起来。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到10.2万亿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第一大国。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和发挥制度优势,充分运用政策手段实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打造跨境电商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并探索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商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国务院于2015年3月批准在杭州设立全国首个综

试区,正式开启跨境电子商务的政策改革历程.

自此之后,综试区在许多城市快速建立起来:2016年1月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第二批综试区;2018年7月—2022年11月又分五批新增北京等共152个城市作为第三批到第七批综试区的设立试点城市.至此全国共有165个城市被批准设立综试区,已覆盖50%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完整而系统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平台已初步搭建起来.

设立综试区的初衷是先行先试跨境电子商务各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这一点在《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5〕44号)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但在设立综试区后,直接的效果却更多体现在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线上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快速增长上.据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统计,从杭州设立综试区的2015年开始—2019年底,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均增速分别达60.5%和27.4%.阿里巴巴国际站《2020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白皮书》则在调研100多家中小企业后发现,即使在疫情影响下,84%的中小企业仍选择加大线上外贸投入.综试区设立大大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与门槛,从而显著增加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内企业数量.

1.2 理论机制

要了解参与贸易的企业数量增加对劳动力市场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大量企业转向国际贸易后,企业利润会如何变化;第二,企业利润发生变化后,企业将怎样调整自身的雇佣状况和支付工资的水平?

1)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市场拥挤.任何一种产品的市场都存在容量限制,绝大多数产品的需求相对于现有生产技术的最大生产能力而言,往往是不足的.因此绝大多数产品市场都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企业,一旦企业数量超过市场所能容纳的数量,就会产生“市场拥挤”,从而降低企业利润水平.如若相信企业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在不受到政策干预的条件下,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应该是最合适的,它能够让这些企业获得各自条件下最理想的收益.

设立综试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干预了市场原来维持的稳态.如前所述,设立综试区后,由于线上对外贸易的进入成本低,大量中小企业开始转向国际贸易或至少在国际市场投入更多资源,这其中有很多企业在以往的线下门槛存在时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产品的国际市场容量随着生产者数量的增加趋于饱和,因而价格竞争更加激烈,最终造成企业利润降低,出现“市场拥挤”.当然,基于对企业理性的信任,可以推测当利润降低到不再高于原本不参与国际贸易时的利润水平后,企业可能选择退出国际市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设立综试区虽然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却没有降低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的成本.退出成本主要包括企业已经投入的资金和生产计划改变带来的新增成本,这些成本很多都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而沉没,很多企业考虑到沉没成本的损失也只能勉强在国际市场支撑,导致调整雇佣规模和(或)劳动力工资变成无奈之举.

2)失业厌恶与雇佣刚性.当企业无法迅速退出国际市场,又在现有市场条件下难以获得理想收益,甚至可能由于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无法收回而存在损失时,就需要考虑节省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当然是节省成本的好方法,但是对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生产而言,短期内更新技术难度很大,更可行的办法是降低现有员工工资或解雇部分员工.

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工资向下刚性”或至少“工资向下粘性”,即企业降低在岗职工工资的难度很大.事实上,在中国不仅存在“工资刚性”,还存在“雇佣刚性”,即企业解雇现有员工的难度很大,这主要源于根深蒂固的“失业厌恶”.设立综试区让许多企业转向国际市场,扩大生产的要求促使企业提高雇佣规模,结果由于国际市场拥挤造成利润降低,又需要将已提高的雇佣规模通过解雇降下来,这恐怕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中国究竟是“工资刚性”更强还是“雇佣刚性”更强?这个问题存在较多争论,但无论结果如何,在“失业厌恶”的氛围下,用降低工资的方法减小成本,至少是企业的选择之一.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而言,设立综试区使部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提高工资用于招聘国际业务人才,而使另一部分企业维系出现困难并降低工资,因而在整体上能

够得出推论1.

推论1 设立综试区和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提高就业的同时,无法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

设立综试区主要便利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贸易,因此可以相信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规模将要扩大,虽然效果的持续时间不一定很长.但是对于设立综试区能否优化就业产业结构,也即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能否鼓励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需要更谨慎的分析.本质问题是,企业转向国际市场后,扩大生产提高雇佣规模,是去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劳动者中招聘,还是就在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中招聘?设立综试区促使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突然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人才需求,企业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培训以往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生产的劳动者,所以更多企业会选择在城市直接招聘诸如毕业生等新人,或曾经从事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最好还从事过国际贸易相关工作的劳动者.综上所述,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很难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据此得出推论2.

推论2 设立综试区和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虽然可能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水平,

但无法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无法提高整体的就业增长率,从而难以实现就业产业结构优化.

以下的实证研究将证明上述推论.

2 数据、变量与识别策略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城市年度库公开中国所有地级市(含直辖市下辖区)100多个指标数据,是本文使用数据的最重要来源.在此基础上对数据做如下筛选:首先,删除指标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其次,删除本文所需核心变量缺失严重的城市和年份,主要包括就业相关变量缺失的城市和年份,并删除时间久远的样本,最后剩下2012年—2021年271个城市样本供实证研究使用.此外,缺失数据通过查询EPS(Express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平台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补充完整,在后文验证政策性质的工作中,还需要匹配海关数据,暂不赘述.

2.2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说明等信息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Explan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变量含义或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就业规模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万人)	38.862	79.182
第二产业就业	城镇单位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万人)	18.367	32.852
第三产业就业	城镇单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万人)	20.166	52.179
工资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年)	60 874.080	17 898.810
就业结构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0.453	0.154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0.537	0.148
就业波动	就业年增长率/%	2.031	99.58
综试区设立	城市设立综试区情况	—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市辖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元/人)	68 494.230	37 638.710
城市消费能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672.468	1 500.661
城市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680.375	1 272.069
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美元)	7.368	22.262
政府财政收入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83.570	566.627
城市规模工业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个	629.007	1 221.736
城市人口规模	城区人口数/(万人)	115.094	223.900

注:之所以未引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下,处理组(即观测期内迟早会被设立综试区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在设立综试区之前,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没有显著差异,留存备索.

2.2.1 被解释变量

为分析综试区设立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按照文献普遍做法,本文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衡量就业整体规模,分产业就业人数反映城市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不仅直接体现就业带来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就业持续增长的潜力,毕竟只有能维持现有岗位较高收入的企业才有创造新岗位的需求和能力^[22]。为了获得更直观的结果,还将引入就业结构和就业波动作被解释变量。上述变量从就业规模、结构、待遇等方面共同衡量城市就业质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综试区设立”。若 2015 年—2020 年城市设立了综试区,则从设立当年起对该城市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2.2.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影响城市就业和被选定设立综试区概率的因素,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这些因素都在城市就业增长过程中起重要作用^[23, 24];财政收入,该指标体现地方政府实施促进就业政策的能力^[25];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和人口规模,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城市就业机会^[26]、就业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潜力。

2.3 识别策略

2021 年以前,综试区曾于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分五批在 105 个城市设立,这种在时间和地区两个层面的渐进变化,为本文使用 Staggered DID 模型评估参与国际贸易企业数量增多对就业的影响提供了条件。具体构建以下模型

$$\gamma_{it} = \alpha_0 + \alpha_1 CBCE_{it} + X_{it}\gamma + \lambda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γ 为被解释变量,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CBCE$ 是核心解释变量“综试区设立”。本文重点关注系数 α_1 , 它代表设立综试区对就业的净影响。 X 为前文所述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 λ_i, v_t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

2.3.1 平衡性检验

参考 Li 等^[27]、李文钊和徐文^[28], 应该使用平衡性检验(Balancing Check)方法证明选取的控制变量足以保证条件独立性满足, 否则 Staggered DID 模型估计结果不可靠。平衡性检验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检验所有控制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步, 证明在引入控制变量之前, 2014 年的因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差异变得不再显著。以上两步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结果表明, 在引入控制变量后, 所有政策实施以前的因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间差异都变得不再显著, 意味着条件独立性得到满足。从理论上说通过平衡性检验, 意味着添加这些控制变量后, Staggered DID 模型估计结果足以真实反映政策效果。

2.3.2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 DID 进行分析的重要前提是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定, 即政策实施前,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因变量无系统差异。本文研究容易受到质疑的一点是, 设立综试区的城市并非随机选出, 最终设立综试区的城市因为开放水平更高和经济实力更强, 使得其在政策干预前就和对照组城市在衡量就业质量各个变量的变化趋势上存在差异。因此需证明在引入控制变量后, 这种差异不再存在。

为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检验平行趋势。选定政策发生前一年作为基准年。观察图 1 发现: 设立综试区和不设立综试区的城市, 在政策实施前就业人数对数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数皆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政策实施后设立综试区的城市在两个因变量指标上开始显著异于未设立综试区的城市, 且随时间推移差异加大, 意味着贸易参与主体规模扩大对两者的因果效应愈发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事件研究法只保留处理组, 可能导致样本量偏小、估计系数标准误偏大,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前平行趋势和事后政策动态分析精度^[29]。为此使用动态双重差分(Dynamic DID)法检验事前平行趋势和事后政策动态效应, 结果无本质差别。篇幅所限未报告结果, 留存备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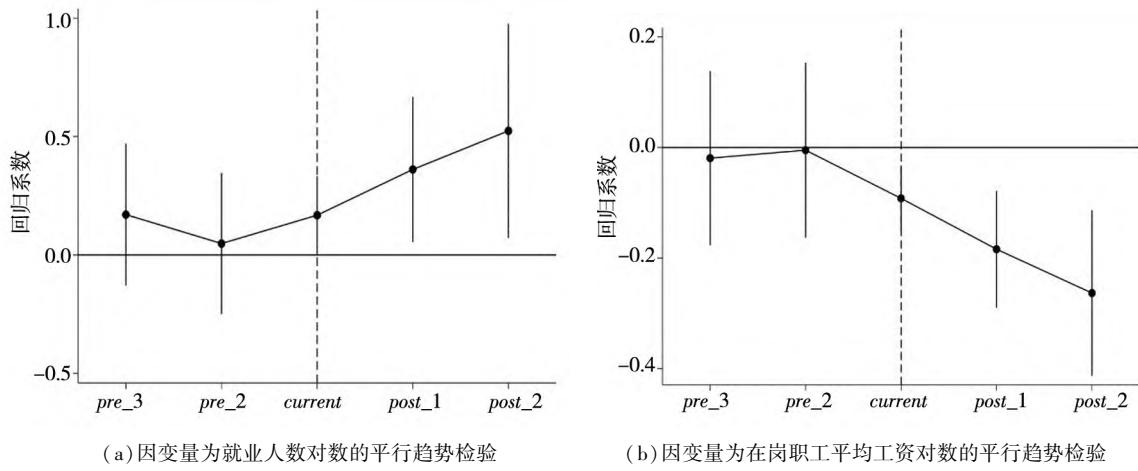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Fig. 1 Parallel trend tests

注: 图中, $pre_n = 1$ (调查年 - 干预年 = $-n$), $post_n = 1$ (调查年 - 干预年 = n), $current = 1$ (调查年 - 干预年 = 0), 其中 $1(\cdot)$ 为示性函数。为防止共线, 将无法看到 pre_1 系数估计值和置信区间。仅报告至事后(相对)两期已满足事前平行趋势检验的需求(并不完备讨论政策动态效果)。篇幅所限未报告其他因变量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留存备索。

3 计量结果与检验

3.1 基础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的估计结果见表 2。可以看到, 在引入一系列控制

变量, 并控制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后, 设立综试区对所有就业变量影响都为正且均在至少 9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但对平均工资无显著影响。说明设立综试区显著提高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就业人数, 却无法提高在岗职工工资水平。该结果初步支持了推论 1。

表2 设立综试区对就业和平均工资的影响

Table 2 The impact of setting up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CPZ) on employment and average wages

因变量(取对数)	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设立综试区	0.062 *** (0.02)	0.103 *** (0.04)	0.054 * (0.03)	0.106 ** (0.05)	0.080 *** (0.02)	0.108 *** (0.03)	0.004 (0.01)	0.015 (0.02)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有效样本量	2 467	1 671	2 446	1 668	2 445	1 669	2 392	1 648
R^2	0.998	0.998	0.989	0.991	0.998	0.998	0.914	0.938

注: 括号中为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 10%、5%、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后文表格若无特殊说明, 均与本表设定类似, 不再赘述。

3.2 稳健性检验

3.2.1 DID-PSM 潜在内生稳定性检验

上述实证工作依赖的前提是, 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可以满足条件独立性假定。虽然平衡性检验和事前平行趋势检验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仍有必要使用基于双重差分的倾向评分匹配法

(简称“DID-PSM”) 来进一步考察主要结论的可靠性。表 3 汇报的结果显示, 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并无本质差异, 证明上述实证结论稳健可靠。倾向评分匹配后, 通过平衡性检验证明了各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分布平衡, 篇幅所限未报告结果, 留存备索。

表 3 设立综试区对就业和平均工资的影响: DID-PSM

Table 3 The impact of setting up the CPZ on employment and average wages: DID-PSM

因变量	就业人数对数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对数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对数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数
解释变量	(1)	(2)	(3)	(4)
设立综试区	0.104 *** (0.037)	0.106 *** (0.020)	0.099 *** (0.020)	-0.107 (0.180)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有效样本量	1 651	1 648	1 649	1 629
Pseudo R ²	0.688	0.687	0.687	0.689

3.2.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的可信性,本节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排除极端值影响。对所有控制变量和因变量进行 1% 缩尾处理后重复基础回归工作;2)排除政策外溢性。在样本观察期外,国家于 2022 年在 60 个城市设立了综试区。由于设立申请和等待批复需要时间,这些城市很可能在样本观察期内就开始受到政策的影响,这是政策的预期效应^[30]。借鉴 Kawaguchi 和 Yukutake^[31],将可能受到政策影响的对照组样本删除后重复基础回归工作;3)安慰剂检验。参考 Li 等^[27]将 271 个城市随机分配进入处理组和对照组并重复 1 000 次基础回归工作。上述稳健性检验详细内容及结果可向作者索要。检验结果均表明,基础回归结论是可靠的。

3.3 综试区政策性质的检验

以上研究有赖于一个基本事实:设立综试区确实显著增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本节

将 2000 年—2016 年海关统计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库进行匹配。通过海关统计数据提供的进出口企业所在地,计算得出各地级市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数量,以考察设立综试区是否增加了城市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数量。考虑到直辖市下辖各区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将直辖市视为整体而不再区分下辖各区。由于只能使用更新到 2016 年海关统计数据,因此本节对地级市数据的时间段选取也做相应调整以实现匹配(使用 2002 年—2016 年 286 个地级市数据)。

表 4 列示的结果表明,设立综试区会显著增加外贸企业数量,包括仅出口的企业数量和仅进口的企业数量。设立综试区全面提高了城市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以表 4 结论为基础,再回顾前文一系列研究结论,可以发现,这种促进大量企业涌入国际贸易市场的政策,确实能够扩大就业规模,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但无法提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表 4 设立综试区对城市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的影响

Table 4 The impact of setting up the CPZ on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cross the city

因变量(取对数)	只有出口的企业数量	只有进口的企业数量	同时有出口和进口的企业数量
解释变量	(1)	(2)	(3)
设立综试区	1.242 *** (0.413)	1.607 *** (0.526)	2.033 *** (0.3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有效样本量	4 123	3 918	3 948
R ²	0.293	0.303	0.247

3.4 剔除贸易规模增长的作用

上述检验虽然能够强化设立综试区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结论,却仍存在缺陷:设立综试区既能增加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也可能增加企业贸

易规模,即同时存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层面的效果。马述忠和房超^[32]发现,2012 年后各项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实施推动中国相关类别出口增长约 4%~9%,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扩展边际的

影响更显著,对集约边际的影响略显滞后。鉴于此,只有证明剔除设立综试区对贸易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后,设立综试区几乎不会对就业和平均工资产生显著影响,才能表明城市就业和工资状况之所以很难实现根本性的改善,是因为设立综试区带来的从事国际市场竞争企业数量增加,造成了“市场拥挤”。

从文献角度,已有研究充分证明贸易规模增长会积极影响工资水平^[33-39],所以既然设立综试区对工资的总影响不显著,而贸易规模增长往往促进工资增长,那么似乎可以推测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增加应该造成了工资下降。但是这种推测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基于这个思路,本文无法推测出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对就业的影响,因为总影响为正,而贸易规模同样对就业存在正向效应;第二,这个推测的思路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数据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何况确实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对外开放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40, 41]。有鉴于此,将原有的因变量除以城市总贸易,获得单位贸易规模下的就业和工资水平,这和在对数线性回

归中直接控制城市贸易水平有类似效果。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设立综试区造成参与贸易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就业和平均工资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表5报告的结果显示,剔除设立综试区对贸易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后,设立综试区几乎对就业和平均工资都不会产生任何正向的影响,甚至大部分影响都是显著负向的。这与理论部分预期相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参与贸易的企业数量增加,那么在市场“拥挤效应”和“雇佣刚性”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就业和工资状况都很难实现根本性的改善,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3.5 异质性分析

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对开放程度变化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理论上说,设立综试区会对不同行业就业规模产生不同的影响。为此,本节选择了六个典型行业就业规模作为因变量,观察设立综试区对它们的影响(表6)。研究发现,设立综试区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制造业、金融业、住宿餐饮业、教育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的就业规模。

表5 设立综试区对单位贸易规模下就业和平均工资的影响

Table 5 The impact of setting up the CPZ on employment and average wages per unit of trade size

因变量	就业/总贸易	第二产业就业/总贸易	第三产业就业/总贸易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总贸易
解释变量	(1)	(2)	(3)	(4)
设立综试区	-0.003 * (0.002)	-0.001 5 (0.00 10)	-0.001 5 ** (0.000 8)	-22.321 * (12.164)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有效样本量	1 670	1 667	1 668	1 647
R ²	0.497	0.454	0.592	0.495

表6 设立综试区对城市不同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

Table 6 The impact of setting up the CPZ on employment siz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因变量(就业人数取对数)	制造业	金融业	住宿餐饮业	教育	信息技术服务	租赁商务服务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设立综试区	0.091 * (0.051)	0.083 * (0.049)	0.193 ** (0.078)	0.106 *** (0.026)	0.445 *** (0.060)	0.140 * (0.076)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有效样本量	1 672	1 668	1 656	1 672	1 664	1 453
R ²	0.991	0.996	0.985	0.971	0.990	0.983

4 进一步分析：设立综试区对就业产业结构和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无法全面反映城市就业质量。一方面，就业人数占比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就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就业持续稳定增长是城市就业发展向好的重要表现，这需要依靠就业增长率来衡量。为此，本节使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与就业年增长率作为因变量，估计设立综试区对它们的影响，进一步观察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与城市就业发展的关系。表 7 第(1)列~第(3)列报告了相应估计结果。

研究发现，设立综试区未改变就业在产业间

的分布结构，因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并没有因为综试区设立而显著提高；设立综试区也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就业增长率。结合基础回归结论，可以得出设立综试区提高就业规模却无法提高就业增速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并不可靠，因为对于就业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来说，就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和幅度肯定要相对较小。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就业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删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样本。据 2014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符合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标准的城市样本删除后，重复估计设立综试区对就业增长率的影响，见表 7 第(4)列。结果表明，即使删除那些就业规模本身就相对较大的城市样本，设立综试区同样无法提高就业增长率。推论 2 得以验证。

表 7 设立综试区对就业产业结构和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Table 7 The impact of setting up the CPZ on the employ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growth rate

因变量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就业增长率
	(1)	(2)	(3)	(4)	
解释变量					
设立综试区	-0.087 (0.829)	-1.146 (1.634)	-0.385 (4.468)	-0.938 (5.310)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有效样本量	1 671	1 669	1 450	1 396	
R ²	0.874	0.866	0.234	0.233	

结合表 7 和表 2 进行分析，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第一，设立综试区扩大城市就业规模，却无法提高就业增长率，意味着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增加，虽然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却减少了已经存在的岗位，只是减少幅度相对较小；第二，设立综试区无法提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充分体现大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可能造成“市场拥挤”的现实。综试区设立大幅降低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使一些生产率和成本优势本未达到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大量进入，客观上的要求迫使企业创造更多岗位，但这些企业的获利能力却还不足以额外的岗位提供同样高的待遇，从而导致就业平均待遇水平无法上升。综上所述，参与贸易

的企业数量增加虽然能短期扩大就业规模，却无法保证企业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足够维持就业岗位的收益。尤其是大量生产率水平未达到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涌入国际市场，在“市场拥挤”的作用下所有企业的获利能力都将受到消极影响，从而提高维持就业岗位和待遇的难度。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条件下，“稳就业”是一个极其重要甚至具有压倒意义的政策目标，但越是就业形势严峻、“稳就业”目标实现的压力巨大，越不能在制定就业促进政策上犯饮鸩止渴的错误。研究显示，新冠疫情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城际消费流动在疫情平稳后一段时间内仍受到负面影响^[42]，疫情防控政策严重破坏运输网络，间接影响了快

递等行业^[43].此外,疫情冲击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各行业劳动力需求都有所下降,有的行业降幅超过10%^[44].因此,对于很多从业者而言,保住工作岗位比维持稳定的收入更重要,必须承认,在疫情影响下为保住工作岗位,暂时的收入下降可以接受,但是长期而言维持和稳定提高岗位待遇,才是提升就业质量的关键,而且蔡昉等^[45]已经证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V”型特征.在此背景下,最终恢复对稳定提高岗位待遇的重视,应该是大势所趋.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市场拥挤的理论和现实,使用2012年—2021年27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Staggered DID框架评估设立综试区对城市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设立综试区外生地增加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进而扩大城市就业规模,但由于市场拥挤效应存在,无法提高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无法实现就业产业结构优化.经过一系列因果识别和检验后,发现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不能提升城市就业质量.

本研究表明,综试区设立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城市就业水平,但政策的就业红利时间短.长期来看,不应该把提高就业质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鼓励企业从事国际贸易上.更重要的是,本文提出应该重新审视对外贸易的就业促进效应.判断对外贸易能否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需要考虑对外贸易水平提高的原因.在对外贸易的就业促进效应上,应该存在“新进者不及在位者”的现象:已经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在位者),参与程度提高(可能表现为出口规模扩大等)意味着其在最大化利润条件下拥有生产更多产品的能力和需要,员工需求较高且获利能力更强,因而可能会提高

其就业创造能力和就业待遇,但是更多未曾参与过国际贸易的企业(新进者)进入国际市场,可能损害劳动力市场效率.在现实中,如果这样的结论真实存在,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市场退出机制的背景下,就业质量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从促进就业的角度来说,培养和提升在位者竞争优势,或许比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更重要.

鉴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参考:

首先,政府应当构建企业退出国际市场的机制.当前,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拥有非常完善的鼓励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政策支持系统,但在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机制建立方面还不够完备.若能构建完善的企业退出国际市场机制,配套相应扶持政策,将获得以下好处:让更多企业能够放心选择进入国际市场,从而保障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让缺乏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低成本退出国际市场,从而保障退出企业的生存能力,还能保障已经在国际市场立足的企业有足够市场空间来维持和发展现有竞争优势.

其次,对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开展动态评估,针对评估结果采取不同措施.对出口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鼓励和支持;对出口竞争力不足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实施针对性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帮助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对出口表现不佳、发展艰难且潜力有限的企业坚决劝退,并启动国际市场退出机制弥补企业沉没成本,保障其安全回到国内市场生存发展.

最后,拓宽就业促进政策的内涵和制定思路,不能将提高就业质量的希望过多地放在鼓励企业出口上.政府应该更多地依靠施加在劳动力市场本身的政策来促进就业增长,而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则应该鼓励其提高出口质量、创新出口技术.

参 考 文 献:

[1]陈昊,陈建伟,司继春.持续出口企业创造了更多就业吗? [J]. 财经研究, 2018, 44(7): 46–59.

Chen Hao, Chen Jianwei, Si Jichun. Does persistent export create more jobs? [J].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8,

- 44(7) : 46 - 59. (in Chinese)
- [2] 田开兰, 杨翠红, 祝坤福, 等. 两败俱伤: 美中贸易关税战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2) : 14 - 27.
Tian Kailan, Yang Cuihong, Zhu Kunfu, et al. Lose-lose consequence: Shock of Sino-US trade war on bilateral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2) : 14 - 27. (in Chinese)
- [3] 齐文浩, 李 震, 邱 阳. 服务业开放阻碍制造业就业了吗?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3, (12) : 38 - 48.
Qi Wenhao, Li Biao, Qiu Yang. Has the open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hindere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 perspective based on industry heterogeneity[J]. China Soft Science, 2023, (12) : 38 - 48. (in Chinese)
- [4] Chu A C, Peretto P, Xu R. Export-led takeoff in a Schumpeterian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3, (145) : 103798.
- [5] 李凯杰, 刘 冰, 董丹丹. 最低工资标准、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 (4) : 157 - 174.
Li Kaijie, Liu Bing, Dong Dandan. Minimum wag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24, (4) : 157 - 174. (in Chinese)
- [6] 魏 浩, 封起扬帆. 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进口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来自“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 (6) : 140 - 157.
Wei Hao, Feng Qiyangfan. Free trade agreements, Chinese imports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hina-Chile Free Trade Agree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24, (6) : 140 - 157. (in Chinese)
- [7] Pissarides C A. Short-run dynamics of unemployment, vacancies and real wa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 (4) : 676 - 690.
- [8] Kasahara H, Lapham B. Productivity and the decision to import and export: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89(2) : 297 - 316.
- [9] 李苏苏, 张少华, 周 鹏.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优势的识别与分解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2) : 48 - 69.
Li Susu, Zhang Shaohua, Zhou Peng. Identific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export firm's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0, 37(2) : 48 - 69. (in Chinese)
- [10] 段连杰. 微观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研究: 出口临界生产率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1) : 50 - 63.
Duan Lianjie. A study on firms' export particip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export cutoff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21, (1) : 50 - 63. (in Chinese)
- [11] 刘 卉, 王永进, 张伯伟. 不确定性、出口市场多元化与企业的生产率进步[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 (8) : 42 - 62.
Liu Hui, Wang Yongjin, Zhang Bowei. Uncertainty,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J]. Nanhai Economic Studies, 2022, (8) : 42 - 62. (in Chinese)
- [12] Vendrell-Herrero F, Darko C K, Gomes E, et al. Home-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moderator of the self-selection and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2, 53(7) : 1519 - 1535.
- [13] 铁 瑛, 刘逸群, 黄建忠. 生产率排序、多产品出口试探与出口稳定性[J]. 经济研究, 2023, 58(1) : 107 - 123.
Tie Ying, Liu Yiqun, Huang Jianzhong. Productivity ranking, multi-product firms export trial and export stabili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3, 58(1) : 107 - 123. (in Chinese)
- [14] Bernard A B, Jensen J B.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Cause, effect, or bo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7(1) : 1 - 25.
- [15] 张 杰, 李 勇, 刘志彪. 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 ——来自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1999—

- 2003[J]. 管理世界, 2009, (12): 11–26.
- Zhang Jie, Li Yong, Liu Zhibiao. Can export promote the rise of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a's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3[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09, (12): 11–26. (in Chinese)
- [16] Ciarli T, Coad A, Moneta A. Does exporting cause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lean firm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3, (66): 228–239.
- [17] 谢恩, 傅宇, 李垣, 等. 国际秩序演化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化[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8): 67–75.
Xie En, Fu Yu, Li Yuan, et al.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1, 24(8): 67–75. (in Chinese)
- [18] 张洪胜, 潘钢健. 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 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21, 56(9): 141–157.
Zhang Hongsheng, Pan Gangjian.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bilateral trade cos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1, 56(9): 141–157. (in Chinese)
- [19] 周沂, 贺灿飞, 杨汝岱. 区域潜在比较优势与出口升级[J]. 经济研究, 2022, 57(2): 125–141.
Zhou Yi, He Canfei, Yang Rudai. Regional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export upgrading[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2, 57(2): 125–141. (in Chinese)
- [20]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 [21] Helpman E, Itskhoki O, Redding S.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in a global economy[J]. Econometrica, 2010, 78(4): 1239–1283.
- [22] Belzil C.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worker reallocation, and wag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0, 18(2): 183–203.
- [23] Griffith R, Macartney G.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innova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 96(1): 135–150.
- [24] 王峰, 葛星. 低碳转型冲击就业吗——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5): 81–99.
Wang Feng, Ge Xing. Can low-carbon transition impact employ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 (5): 81–99. (in Chinese)
- [25] 郭新强, 胡永刚. 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J]. 经济研究, 2012, 47(S2): 5–17.
Guo Xinqiang, Hu Yonggang. Employment effects of China'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ts expenditure structure bia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2, 47(S2): 5–17. (in Chinese)
- [26] 刘东升, 王永中. 机器人应用对就业转移的影响[J]. 财经研究, 2025, 51(2): 79–93.
Liu Dongsheng, Wang Yongzhong. The impact of robot applications on employment transfer[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5, 51(2): 79–93. (in Chinese)
- [27] 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 18–37.
- [28] 李文钊, 徐文. 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 一个实验与准实验设计的统一框架[J]. 管理世界, 2022, 38(12): 104–123.
Li Wenzhao, Xu Wen. Policy evaluation research based on causal inference: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12): 104–123. (in Chinese)
- [29] 黄炜, 张子尧, 刘安然. 从双重差分法到事件研究法[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 (2): 17–36.
Huang Wei, Zhang Ziyao, Liu Anran. From Difference-in-Difference to event study[J].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 2022, (2): 17–36. (in Chinese)
- [30] Vanhoose D, David D. Discount rate policy and alternative Federal Reserve operating procedures in a rational expectations set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88, 40(4): 285–294.
- [31] Kawaguchi D, Yukutake N. Estimating the residential land damage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7, (99): 148–160.
- [32] 马述忠, 房 超. 跨境电商与中国出口新增长——基于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双重视角[J]. 经济研究, 2021, 56(6): 159–176.
Ma Shuzhong, Fang Chao.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new export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es of scal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1, 56(6): 159–176. (in Chinese)
- [33] 王立勇, 胡 睿. 贸易开放与工资收入: 新证据和新机制[J]. 世界经济, 2020, 43(4): 145–168.
Wang Liyong, Hu Rui. Trade openness and wages rates: New evidence and a new mechanism[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0, 43(4): 145–168. (in Chinese)
- [34] 杨 曦, 杨宇舟. 全球价值链下的区域贸易协定: 效应模拟与机制分析[J]. 世界经济, 2022, 45(5): 29–56.
Yang Xi, Yang Yuzhou.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ith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alyses on effects and mechanism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2, 45(5): 29–56. (in Chinese)
- [35] 张 群, 邱 斌, 孙少勤. RCEP 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贸易与福利效应估计[J]. 世界经济, 2023, 46(6): 3–30.
Zhang Qun, Qiu Bin, Sun Shaoqin.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under the RCEP[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3, 46(6): 3–30. (in Chinese)
- [36] 钱学锋, 孙曼玉. 中国“减退税并举”政策的经济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察[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 (7): 1–19.
Qian Xuefeng, Sun Manyu.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tax reduction and rebates” policy: Research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024, (7): 1–19. (in Chinese)
- [37] Chen Q.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trade elasticities and welfare[J]. Applied Economics, 2024, 56(59): 8606–8622.
- [38] 马野青, 庄金凤, 范子杰.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及福利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5, (3): 22–40.
Ma Yeqing, Zhuang Jinfeng, Fan Zijie.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5, (3): 22–40. (in Chinese)
- [39] 方玉文, 张少军, 李善同.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贸易壁垒分析——关联效应、因素分解与福利效应[J]. 经济学(季刊), 2025, 25(2): 310–327.
Fang Yuwen, Zhang Shaojun, Li Shantong. Trade barriers of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Correlation effects, 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welfare effect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5, 25(2): 310–327. (in Chinese)
- [40]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J]. 经济研究, 2009, 44(1): 70–82.
Li Daokui, Liu Linlin, Wang Hongling. The U-curve of labor share in GDP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4(1): 70–82. (in Chinese)
- [41] 包 群, 邵 敏, 侯维忠. 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 [J]. 经济研究, 2011, 46(9): 41–54.
Bao Qun, Shao Min, Hou Weizhong. Does exporting improve employee income?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46(9): 41–54. (in Chinese)
- [42] 黄逸雨, 卢向华, 许 博. 疫情与城际消费流动: 基于城市消费功能及产业数字化视角[J]. 管理科学学报, 2023, 26(5): 248–270.
Huang Yiyu, Lu Xianghua, Xu Bo. COVID-19 and intercity consumption flow: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consumption func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3, 26(5): 248–270. (in Chinese)

- [43] Liu J, Tang J, Sun M.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revention and economic interventions on express delivery industr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9(1): 16–37.
- [44] 杨振山, 魏嘉男.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疫情经济影响及政策评估——基于全球贸易模型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23, (4): 11–19.
Yang Zhenshan, Wei Jianan. Impacts of COVID-19 on Chinese economy and intervention of fiscal policies: Based on GTAP Model[J]. China Soft Science, 2023, (4): 11–19. (in Chinese)
- [45] 蔡昉, 张丹丹, 刘雅玄.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J]. 经济研究, 2021, 56(2): 4–21.
Cai Fang, Zhang Dandan, Liu Yaxua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tracking surve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1, 56(2): 4–21. (in Chinese)

Policy realization or paradoxical outcomes: Trade participation, market crowding,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CHEN Hao¹, ZHAO Zi-wei¹, MENG Yi-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Accounting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both a theoretical and an empirical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encouraging more firms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ay enhance urban employment quality. Theoretically, the concept of market crowding is introduced and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fluences the labor market quality is outlined. Empirically, the staggered DID model i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even though the number of firm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xpanded urban employment, the market crowding effect does not result i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average wage of urban on-the-job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s not optimized.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rade participants canno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should not be fully expected from firms'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order to maintain firms' continued ability to create jobs and offer work benefit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encourage firm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ut also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firms to exit the global marke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participation; market crowding;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quality; staggered DID